

2006 ~ 2016 年少数民族省区生育水平研究^{*}

——基于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

原 新 刘绘如 刘旭阳 刘志晓

【内容摘要】文章使用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的少数民族省区数据,运用时期和队列指标,从数量、结构和时间 3 个维度来分析 2006 ~ 2016 年少数民族省区的生育水平。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省区总和生育率 10 年间趋势性上升,已然回到更替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水平高于汉族;分孩次分析,少数民族妇女各孩次生育率水平均高于汉族,汉族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明显,生育政策效果凸显;分民族分析,维吾尔族和苗族生育行为强劲,彝族倾向生育两个孩子,藏族生育冲动相对较弱;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生育高峰段均从 20 ~ 24 岁推迟至 25 ~ 29 岁,汉族高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升高明显,生育年龄逐步提高,汉族生育年龄迟于少数民族。总体判断,少数民族省区处于适度的生育率水平。

【关键词】少数民族省区;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生育模式

【作者简介】原新,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刘绘如(通讯作者)、刘旭阳、刘志晓,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Fertility Levels and Trends in China's Ethnic Minority Provinces, 2006 – 2016: Based on 2017 China Fertility Survey

Yuan Xin Liu Huiru Liu Xuyang Liu Zhixiao

Abstract: Based on 2017 China Fertility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fertility levels and trends over 2006 – 2016 in the ethnic minority provinces in China, using period and cohort measures of fertility incorporating quantity, structure and timing dimen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of ethnic minority provinces has increased to the replacement level in the past ten years,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fertility rate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is is the case at all parities. The second-child fertility of Han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highlighting the marked effects of the two-child policy. By ethnic group, the Uygur and Miao have strong fertility behaviors, meanwhile the Yi tends to have two children, while the Tibetans are reluctant to have more children. The fertility peak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has been postponed from 20 – 24 years to 25 – 29 years, and the fertility level at the older age group of Han nationality has increased, pushing up the mean age at childbearing with that being higher of Han nationality than that of ethnic minorities. Overall, the ethnic minority provinces are at a moderately high fertility level.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Provinces, Total Fertility Rate, Lifetime Fertility Rate, Fertility Pattern

Authors: Yuan Xin is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Nankai University of China; Liu Huiru, Liu Xuyang and Liu Zhixiao are PhD Candidates,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Nankai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yuanxin@nankai.edu.cn

^{*} 本文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课题“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分析及全面两孩政策效果第三方评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总原则和总政策的指导下,少数民族省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人口持续平稳增加,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3532万人增至2015年1.17亿人,扩大2.32倍,年均增长率为1.94%,比汉族人口年均增长率高0.60个百分点,相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6.06%提高到8.54%。

在死亡率已经长期维持且稳定在低水平的情形下,生育是直接决定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2000年以来,除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年份公布生育状况数据以外,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不再发布总和生育率指标,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2005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生育率之谜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特别是2005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相继走出了各省陆续取消生育间隔、单独二胎政策和全面两孩政策三步,生育率水平及其走向更是成为关注焦点。

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为认识最近10年的生育水平变动提供了基础资料。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和青海省8个少数民族省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区域。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省区总人口合计为1.95亿,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各占62.10%和37.90%。与全国比较,少数民族省区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4.21%,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63.18%,汉族人口只占全国汉族人口总数的9.63%,少数民族人口高度聚集。本文以8个少数民族省区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少数民族省区妇女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水平,为全面认识少数民族的生育现状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提供基础性资料。

2 文献综述

目前,对全国生育水平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如何准确估计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以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王广州、张丽萍(2012)估算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44左右,超过1.64的可能性很小;尹文耀等人(2013)测算出2006~201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481;陈卫(2015)通过整合法和变量 r 法综合估计出2000~201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6左右;米红、杨明旭(2016)利用人口留存分析法,判断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下限值为1.595。以户籍登记数据为基础,翟振武等人(2015)估计出2008~2010年总和生育率为1.63~1.66。以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贺丹等人(2018)测算出2006~2011年总和生育率大致维持在1.60~1.70之间,2016年总和生育率达到1.77。另外,王金营、戈艳霞(2016)采用多个数据库,在对现状生育率估算的基础上,预测2020~2030年总和生育率水平保持在1.76~1.80。这些研究不论在数据的选择和处理上,还是在生育率测算方法的改进上都颇具借鉴意义。

国内学者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生育水平的研究较为鲜见。其中,张丽萍(2013)采用全国大型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描绘了1950~2010年少数民族生育转变的全景图,认为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代7.0以上开始下降,1982年降至4.0,1995年达到更替水平并长期稳定在1.8上下。些许研究选择单一民族或单一地区小样本调查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民族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如薛继亮(2016)比较分析了蒙古族和汉族的生育水平,认为蒙古族生育水平持续下降,201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09,低于全国和汉族生育率的平均水平。这类研究有助于分析极具特征的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但缺乏对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水平的整体把握,而且近10年国内几乎没有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水平的文献,因此,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专门对我国少数民族省区的生育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2017 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了“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调查时点为 2017 年 7 月 1 日零时,调查对象为中国大陆 15~60 岁的女性人口,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方法抽取样本,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获得有效调查样本 249946 个,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生育行为、生育意愿、避孕节育方法和生育养育服务 4 个方面。本文选取“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的西藏、新疆、广西、宁夏、内蒙古、云南、贵州和青海 8 个少数民族省区的原始调查数据,有效样本量 45998 个,汉族占比 59.8%,少数民族占比 40.2%,调查地主要少数民族包括壮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和回族,2017 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 8 个少数民族省区的民族构成与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民族构成的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7 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与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民族构成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ample Ethnic Distribution in 2017 Fertility Survey and the Ethnic Distribution in 2015 One-Percent Population Survey

数据	少数民族省区(%)		少数民族省区主要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汉族	少数民族	壮族	藏族	蒙古族	维吾尔族	苗族	彝族	回族	合计
2017 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	59.8	40.2	8.8	2.5	2.6	5.8	3.4	3.4	2.9	29.4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	62.1	37.9	8.5	2.4	2.4	5.6	2.9	2.9	3.0	27.7

资料来源:2017 年数据为本文根据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 8 个少数民族省区的数据计算得到;2015 年数据为本文根据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横向与纵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是横向分析,采用时期分析方法,以某个年度各个不同年龄组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以假定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生育经历为标准计算多个出生队列妇女在这个年度的生育水平,如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年龄别生育率等;二是纵向分析,采用队列分析方法,对某个出生队列的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经历进行跟踪分析,刻画这个出生队列实际发生的生育状况和生育水平,如终身生育率等。根据调查实施方提供的少数民族省区权重系数,本研究在对调查数据加权处理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少数民族省区妇女的生育水平,区域外部,与全国妇女生育水平进行比较,区域内部,对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不同少数民族妇女之间的生育水平进行比较,全面刻画少数民族省区的生育现状。

4 主要发现

4.1 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是在人口分析和决策中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综合指标。

(1) 少数民族省区总和生育率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已经回到更替水平。2006 年少数民族省区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84,2011 年升至 2.01,之后,除了 2015 年跌至 1.79 以外,其他年份均在 2 以上,2016 年达到近 10 年以来的最高值 2.19,回升到更替水平(见表 2)。2006~2016 年少数民族省区妇女平均总和生育率为 1.97,略低于更替水平。

少数民族省区妇女的生育率变动轨迹与全国基本一致,但生育率水平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度总和生育率始终高于全国平均值约 12%~25%,且生育率水平上升幅度快于全国平均值。2006~2016 年,少数民族省区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 1.84 增至 2.19,增幅为 19.02%,而同期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 1.62 增至 1.77,只增加 9.3%,前者增加幅度比后者高 1 倍以上。

10 年间,无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少数民族省区,2012 年生育率升高和 2015 年生育率下跌现象

都很明显,主要原因:一是受传统文化中生肖属性的生育效应的影响,传统生育文化中生肖龙年(2012年)多生和生肖羊年(2015年)少生是普遍规律;二是受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影响,伴随2013和2015年相继宣布实行单独二胎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政策对生育率的刺激效应在新生育政策公布后翌年开始释放,2014和2016年的生育率升高明显,更加放大了2015年的生育率跌落现象。以少数民族省区为例,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显著凸起,分别比相邻两个年份(2011和2013年)高6.5%和3.9%,而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显著凹陷,分别比相邻两个年份(2014和2016年)低14.5%和22.3%。

表2 2006~2016年少数民族省区总和生育率和分孩次总和生育率

Table 2 Total Fertility Rate by Parity in Ethnic Minority Provinces, 2006-2016

民族	孩次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计	合计	1.84	1.82	1.94	1.93	1.87	2.01	2.14	2.06	2.05	1.79	2.19
	一孩	1.07	1.06	1.11	1.11	1.07	1.15	1.21	1.07	1.10	0.93	1.13
	二孩	0.62	0.63	0.65	0.68	0.70	0.71	0.79	0.83	0.79	0.75	1.00
	三孩+	0.15	0.13	0.18	0.14	0.10	0.15	0.15	0.16	0.16	0.11	0.06
少数民族	合计	1.96	1.92	2.02	2.12	2.09	2.26	2.35	2.30	2.26	1.92	2.14
	一孩	1.09	1.08	1.05	1.23	1.16	1.29	1.25	1.08	1.12	0.93	1.06
	二孩	0.68	0.67	0.73	0.72	0.76	0.78	0.89	0.94	0.86	0.84	0.97
	三孩+	0.19	0.16	0.24	0.17	0.17	0.19	0.20	0.28	0.28	0.16	0.11
汉族	合计	1.76	1.76	1.88	1.79	1.72	1.84	1.99	1.88	1.90	1.70	2.22
	一孩	1.05	1.05	1.15	1.02	1.00	1.05	1.18	1.07	1.07	0.93	1.18
	二孩	0.57	0.60	0.60	0.64	0.66	0.66	0.70	0.74	0.74	0.69	1.02
	三孩+	0.13	0.11	0.13	0.13	0.05	0.12	0.11	0.08	0.08	0.08	0.02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为本文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8个少数民族省区的数据计算得到,后文图表资料来源同表2。

(2) 内部比较,少数民族省区汉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低于少数民族妇女是普遍现象。少数民族省区汉族妇女2006~2016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86,低于更替水平,少数民族妇女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12,达到更替水平。动态观察,少数民族省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率水平均呈上升趋势,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06年的1.96增至2012年(龙年)达到最高值2.35,高于更替水平,同期汉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76升至1.99,接近更替水平。经历了2015年(羊年)生育水平的显著回落后,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16年又继续上升,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回升至2.14,汉族妇女总和生育率反超少数民族妇女,达到2.22,升至更替水平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全面两孩政策的生育效应在汉族育龄妇女中的集中释放效果。比较2006和2016年,汉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上升了26.1%,少数民族妇女只升高了9.2%,汉族妇女总和生育率增加幅度是少数民族妇女的2.8倍。

(3) 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政策效应在汉族妇女中体现得更加显著。汉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增幅大而且在2016年反超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这充分体现了单独二胎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落地后生育堆积集中释放的现象。解析少数民族省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妇女的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可以发现(见表2),2006~2016年,除了少数民族妇女各孩次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高于汉族妇女的特征外,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的一孩总和生育率(除2015年外)始终稳定在1以上,一孩生育持续稳定;二孩总和生育率均表现为趋势性攀升,汉族妇女二孩总和生育率从不足0.6升至1以上,少数民族妇女二孩总和生育率从不足0.7升至接近1;汉族妇女多孩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少数民族妇女多孩总和生育

率则基本稳定。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分孩次总和生育率的差异性变化印证了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影响。

4.2 终身生育率和孩次递进比

终身生育率是队列指标,反映同一个出生队列的妇女度过育龄期后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生育孩次递进比(a_i)反映同一个出生队列妇女中,生育过第 i 孩的妇女继续生育第 $i+1$ 孩的比例。在不考虑死亡、迁移及双(多)胞胎的情况下,已经度过育龄期的妇女的生育孩次递进比,就是该出生队列妇女终身生育经历的真实反映。

(1) 终身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第一,少数民族省区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为 2.23,其中,汉族、少数民族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分别为 2.15、2.38(见表 3),均在更替水平之上,而且高于 2006~2016 年平均总和生育率。第二,用平均曾生子女数检验终身生育率水平发现,少数民族省区退出育龄期的 50~60 岁妇女平均曾生子女数为 2.52 个,其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分别为 2.38、2.79 个,均高于更替水平。第三,已经退出生育旺盛期的 35~49 岁高龄育龄妇女,总体平均曾生子女数为 2.05 个,汉族为 1.96 个,少数民族为 2.18 个,均在更替水平左右。与 50~60 岁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和终身生育率相比,还有一定的生育空间。

少数民族省区主要少数民族的终身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之上,维吾尔族终身生育率最高,为 2.61,其次是苗族,为 2.57,蒙古族和藏族相对较低,分别为 2.10 和 2.14。

(2) 不同民族的孩次递进比各具特色。50~60 岁少数民族妇女生育一孩递进比(a_0 : 0→1)为 0.984,汉族为 0.993,二者差别很小,说明几乎所有已经度过育龄期的妇女都生育了第一个孩子;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生育二孩递进比(a_1 : 1→2)明显分化,少数民族妇女依然高达 0.913,汉族妇女仅为 0.780,这意味着育有一孩的少数民族妇女中,只有 8.7% 没有再生育第二孩,而 22.0% 的育有一孩的汉族妇女停止了再生育,二者相差 13.3 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生育三孩递进比(a_2 : 2→3)的差距相对较小,55.6% 的有两个孩子的少数民族妇女生育了第三个及以上孩子,汉族妇女的这一比例为 48.8%。

分民族观察(见表 3),除藏族外,所有少数民族妇女的一孩递进比均高达 98% 以上,几乎每个妇女都生育了第一个孩子,藏族妇女的一孩递进比最低,只有 0.898,也即约 10% 的藏族妇女没有生育第一孩;二孩递进比的差异化明显,92%~95% 已经育有一个孩子的苗族、彝族、壮族和维吾尔族妇女,都继续生育了第二个孩子,这一比例在回族、藏族和蒙古族妇女中只有 80%~85%;三孩递进比的民族差异更大,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妇女中,有超过 3/4 的维吾尔族妇女还会继续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孩子,2/3 的苗族和藏族妇女会继续生育,而 2/3 的彝族和蒙古族妇女会停止生育第三孩。总体判断,维吾尔族和苗族的各孩次递进比均高,多孩生育普遍,二孩生育相对较弱的是蒙古族、藏族和回族,多孩生育最低迷的是蒙古族和彝族。

表 3 2017 年少数民族省区 50~60 岁妇女分民族的孩次递进比和终身生育率

Table 3 Parity Progression Ratios and Lifetime Fertility Rate of Women between 50 and 60 by Ethnic Group in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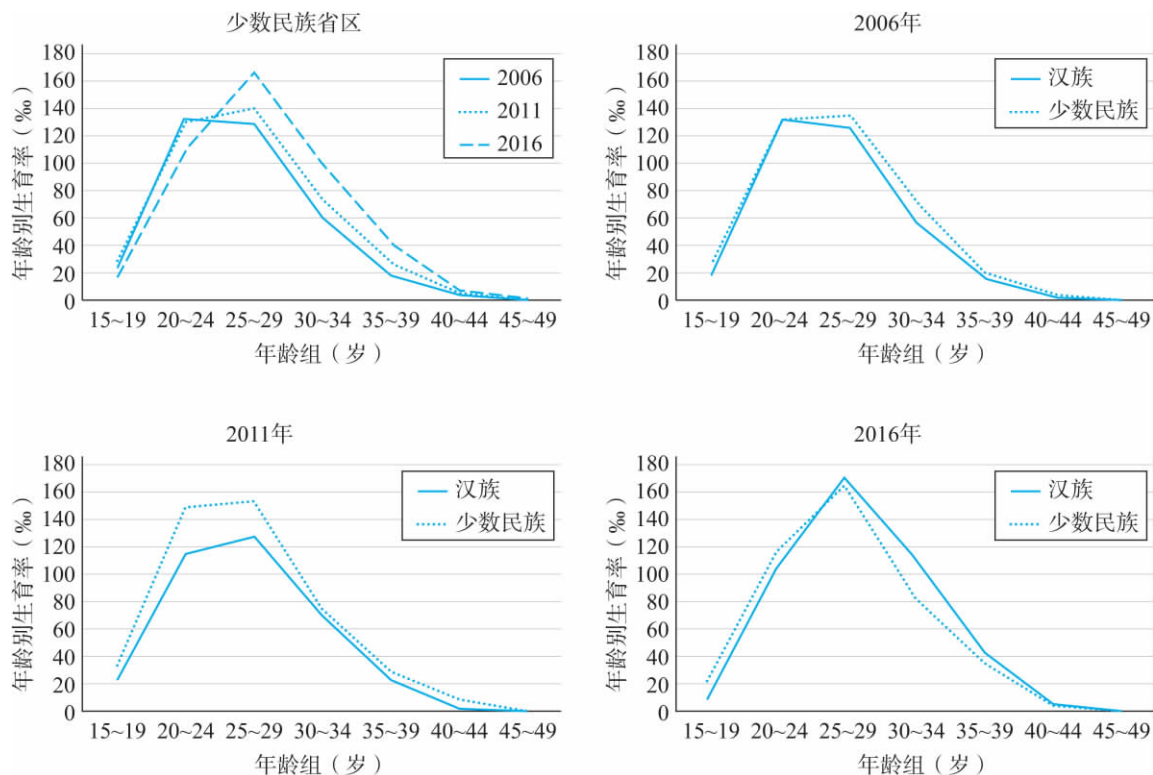
指标	少数民族省区			少数民族省区主要少数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合计	壮族	藏族	蒙古族	维吾尔族	苗族	彝族	回族
一孩递进比 a_0	0.993	0.984	0.990	0.991	0.898	0.991	0.987	0.997	0.984	0.986
二孩递进比 a_1	0.780	0.913	0.827	0.940	0.839	0.808	0.929	0.948	0.944	0.851
三孩递进比 a_2	0.488	0.556	0.514	0.515	0.656	0.384	0.772	0.668	0.371	0.579
终身生育率	2.15	2.38	2.23	2.40	2.14	2.10	2.61	2.57	2.26	2.31

4.3 生育模式

本研究比较了少数民族省区妇女 2006、2011 和 2016 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其总体表现出生育峰值上升、峰值年龄后移、大龄生育率升高、晚育现象加重的特点(见图 1)。

图 1 2006、2011 和 2016 年少数民族省区妇女分民族的年龄别生育率

Figure 1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 by Ethnic Group, 2006, 2011 and 2016



(1) 生育峰值从双峰转为单峰,且峰值增高。比较少数民族省区妇女 2006、2011 和 2016 年 3 年的生育模式,可见晚育趋势日渐明显。2006 和 2011 年少数民族省区妇女的生育模式表现为双峰,即年龄别生育率曲线中会出现两个生育率数值差异很小的峰值,本研究将其分别命名为高峰值和次高峰值,如图 1 所示,2006 和 2011 年的高峰值和次高峰值都落在 20~24 岁和 25~29 岁两个年龄组内。但是,2006 年高峰值为 131.70‰,落在 20~24 岁组,次高峰值为 128.79‰,落在 25~29 岁组;2011 年高峰值为 139.07‰,推后至 25~29 岁组,次高峰值为 129.04‰,落在 20~24 岁组,与 2006 年相比,2011 年的生育高峰值年龄整体推迟 5 岁。2016 年少数民族省区妇女的生育模式转变为单峰,峰值生育率为 165.66‰,落在 25~29 岁组,峰值生育率比 2006 年增加了 1/4,25~29 岁成为生育行为最为集中的年龄段。

(2) 动态考察,高年龄组生育率上升,低年龄组生育率下降。2006~2016 年,少数民族省区 35~39 岁妇女的生育率从 17.63‰升至 40.87‰,增加了 1.3 倍,而低龄组妇女生育率明显降低,20~24 岁妇女生育率从 131.70‰降至 108.86‰,降幅为 17.34%。整体上,2016 年 25 岁以前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均低于 2006 和 2011 年相应年龄组生育率;25 岁之后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均高于 2006 和 2011 年相应年龄组生育率,呈现出推迟生育和大龄生育增加的现象。

(3) 分民族考察,汉族 25 岁以后的妇女生育率水平超过少数民族。2016 年汉族 25~29 岁、30~34 岁、35~39 岁、40~44 岁 4 个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依次为 167.98‰、109.98‰、44.03‰和

6.67‰,分别高于少数民族相应年龄组妇女生育率5.61、26.47、7.35和0.37个千分点,表明汉族妇女的生育年龄普遍较大。

(4) 生育年龄逐步提高,汉族迟于少数民族。如表4所示,第一,初育年龄提高。少数民族省区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从2006年的22.9岁增至2016年的24.6岁,其中,汉族、少数民族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分别从23.2岁、22.5岁增长至25.1岁、23.9岁,汉族增加1.9岁,少数民族增加1.4岁。第二,汉族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始终高于少数民族妇女,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2006年相差0.7岁到2016年相差1.2岁。第三,再育年龄逐渐推迟,2006~2016年,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的平均再育年龄分别推迟了0.6岁和1.4岁。第四,一、二孩生育间隔变化不大,汉族和少数民族妇女生育间隔的变动均在3~4年之间。

表4 2006~2016年少数民族省区妇女分民族、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

Table 4 Mean Age at Childbearing by Parity and Ethnic Group, 2006-2016

年份	平均初育年龄(岁)			平均再育年龄(岁)		
	少数民族	汉族	合计	少数民族	汉族	合计
2006	22.5	23.2	22.9	26.5	26.9	26.8
2007	22.9	23.4	23.2	26.6	27.3	27.0
2008	22.8	23.2	23.0	26.2	26.7	26.5
2009	23.0	23.4	23.2	26.0	26.4	26.2
2010	22.3	23.2	22.8	26.7	26.6	26.6
2011	23.1	23.5	23.3	25.9	27.1	26.5
2012	23.3	24.0	23.7	26.3	27.0	26.7
2013	23.0	24.1	23.7	26.3	27.5	27.0
2014	23.4	24.5	24.1	26.5	27.7	27.2
2015	24.3	25.0	24.7	26.7	27.5	27.1
2016	23.9	25.1	24.6	27.1	28.3	27.9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时期分析和队列分析方法,从数量、结构和时间3个维度深入全面分析少数民族省区的生育状况,得出的主要结论为:第一,在生育水平方面,汉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始终低于少数民族妇女,但在2016年反超,2006~2016年,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的生育率变化趋势一致,汉族妇女总和生育率增速较快。第二,在生育结构方面,少数民族妇女各孩次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基本都高于汉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妇女的一孩生育都比较积极,几乎所有妇女都生育第一孩,少数民族妇女继续生育第二孩,甚至第三孩的积极性远高于汉族妇女。第三,在民族差异方面,维吾尔族和苗族妇女生育行为强劲,倾向多生,彝族妇女多倾向生育两个孩子,藏族妇女的生育冲动相对较弱。第四,在生育时间方面,少数民族省区妇女的生育高峰时间普遍推迟,大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日渐升高,低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逐渐下降,生育行为更加集中在25~29岁,生育年龄呈现趋势性推迟,初育和再育的平均年龄都不断延迟,平均生育间隔稳定在3~4年。

5.2 讨论

单从少数民族省区的生育现状来看,其总和生育率更加接近适度生育水平,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但如果把视域扩大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省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

第一,少数民族省区生育水平继续长周期变化规律,延续了适度生育水平。长周期考察新中国成

立以来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的动态变化,其从 1950 年的 4.2 一度攀升至 1963 年最高峰值 7.3(三年困难时期除外);1970 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时,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为 6.0 左右;伴随全国生育率水平下降,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1983 年为 4.01,1995 年降至更替水平;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到 2005 年期间一直徘徊在 1.85 上下的适度生育水平范围内(张丽萍,2013)。近 10 年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少数民族省区接续了少数民族生育水平的长周期变化规律,总和生育率虽然略有回升,依然在更替水平上下,延续着适度生育水平。单从生育水平判断,少数民族省区的总和生育率虽有波动,但始终徘徊在更替水平上下,其中,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略高于总人口平均水平,汉族的生育水平略低于总人口平均水平,这种生育水平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省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第二,少数民族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亟待提升。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无论汉族人口还是少数民族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就业结构、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均大幅度提升,生活方式、生育理念、生育行为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自愿性的少生和优生逐渐成为主流。但必须注意到,少数民族省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经济实力相对不足,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农牧业经济形态为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后,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扶贫攻坚和精准脱贫任务繁重,人口发展本身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压力并没有根本性改善。随着精准扶贫和全面脱贫过程向纵深推进,少数民族省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区域。促进少数民族省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更大,促进少数民族省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第三,少数民族省区需要继续高度关注人口问题。生育政策是生育水平转变的助推器,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宪法》指出“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有计划、负责任的生育是法律规定各民族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考虑到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区域分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因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一直实行有别于汉族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开始时间晚,政策规定适度放宽,执行力度相对较弱是基本特征。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延续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省级决策的基本原则,少数民族省区在 2016 和 2017 年相继修订了《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对于新时代少数民族生育的政策规定可分为 3 个方面:(1) 基本规定,除西藏未出台新政策,新疆规定城镇两孩、农村三孩外,其他省区均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2) 对人口较少民族和条件艰苦地区适度放宽,如在西藏边境农牧区的乡(区)和门巴族、珞巴族以及夏尔巴人、僜人中,不设生育指标;宁夏山区八县少数民族农村居民可生育第三胎;云南少数民族农村居民和边境村居民,以及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阿昌族、怒族、普米族、布朗族、景颇族可生育第三胎。(3) 再生育的特殊政策,针对所有居民制定了可再生育的特殊条件,少则五条,多则九条,如子女因非遗传疾病不能正常成长为劳动力、再婚夫妇一方未生育过等。

在计划生育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新时代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观已经从紧缩型走向适度宽松型。加快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转型,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和优化结构并举转变,由管理为主向服务家庭转变,由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共治转变;更加注重家庭计划,更加注重家庭支持政策体系,更加注重推动家庭发展,更加注重提升人口综合素质,对于深入做好新时代少数民族省区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促进少数民族省区人口均衡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陈卫. 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中国生育率估计. 人口研究, 2015; 6: 35-43
Chen Wei. 2015. China's Fertility Estimation: A Generalized Stable Population Approach. Population Research 6: 35-43.
- 2 贺丹, 张许颖, 庄亚儿, 王志理, 杨胜慧. 2006~2016 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人口研究, 2018; 6: 35-45
He Dan, Zhang Xuying, Zhuang Yaer, Wang Zhili and Yang Shenghui. 2018. China Fertility Status Report, 2006-2016: An Analysis Based on 2017 China Fertility Survey. Population Research 6: 35-45.
- 3 米红, 杨明旭. 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的修正与评估研究——基于 1982~2010 年历次人口普查、1% 抽样调查数据. 人口与发展, 2016; 2: 12-19
Mi Hong and Yang Mingxu. 2016. Reassessment of the Under-reported Rate,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Sex Ratio at Birth: Based on the National Census and 1% Sample Survey Data during 1982-2010.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2: 12-19.
- 4 王广州, 张丽萍. 到底能生多少孩子? ——中国人的政策生育潜力估计. 社会学研究, 2012; 5: 119-140, 244
Wang Guangzhou and Zhang Liping. 2012. How Many Births Can We Have? An Estimation of the Potential Policy Fertility. Sociological Studies 5: 119-140, 244.
- 5 王金营, 戈艳霞.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 人口研究, 2016; 6: 3-21
Wang Jinying and Ge Yanxia. 2016. Population Trends in China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Population Research 6: 3-21.
- 6 薛继亮. 族际通婚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来自内蒙古的验证. 人口学刊, 2016; 5: 25-33
Xue Jiliang. 2016. The Impacts of Cross-ethnicity Marriage on Fertility Level. Population Journal 5: 25-33.
- 7 尹文耀, 姚引妹, 李芬. 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6: 109-128, 206-207
Yin Wenyao, Yao Yinmei and Li Fen. 2013. Fertility Level Assessment and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 An Analysis of the Provincial Data on Fertility Level in Mainland Chin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6: 109-128, 206-207.
- 8 翟振武, 陈佳鞠, 李龙. 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 ——来自户籍登记数据的新证据. 人口研究, 2015; 6: 22-34
Zhai Zhenwu, Chen Jiaju and Li Long. 2015. China's Recent Total Fertility Rate: New Evidence fro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istics. Population Research 6: 22-34.
- 9 张丽萍.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3; 5: 96-102
Zhang Liping. 2013.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5: 96-102.

(责任编辑: 陈佳鞠 收稿时间: 2019-03)